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7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藝術理論前沿：
傳媒與現代性



四川大学出版社

藝術理論前沿：
傳媒與現代性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27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张 丹
责任编辑:欧风偃
责任校对:黄蕴婷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27 / 曹顺庆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614-8154-7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G112-53②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5535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27)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154-7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18.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专 论

- 1 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径 曹顺庆 时 光

艺术理论前沿

- 20 论解分化作为艺术研究的思想视野
——对重建艺术研究思想背景的一个简要考察 吴兴明
- 42 许燎源的艺术及其启示 邱晓林
- 48 艺术作品存在，它们何以可能？
——对卢卡奇艺术可能性问题的深层解读 王 静 王 蕾
- 56 在瞬间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中存在
——经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对话列维纳斯的《从
存在到存在者》 张郑波
- 69 当代建筑艺术中的审美病态倾向探析 张 熹
- 79 比较文学视阈下的爵士乐音乐形象接受研究 魏登攀
- 90 评古街区开发与保护问题的争论
——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 张 婷

马克思主义研究

- 97 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喜剧美学 傅其林
- 110 书籍史与形式史 高树博
- 121 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特里·伊格尔顿对形式主义批
评的反思与批判 巴 微 段吉方

传媒与现代性

- | | | |
|-----|---------------------|-------------|
| 132 | 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理论的价值及局限性 | 陈 功 张顺军 赵 华 |
| 146 | 论受众主体的空间修辞 | 周 毅 赵云龙 |
| 155 | 汤普森现代文化媒体化理论评析 | 罗金成 |

电影与文学

- | | | |
|-----|--------------------------------|---------|
| 168 | 身体的反抗
——徐静蕾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再解读 | 陈佑松 |
| 178 |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之隐喻与现代性审思 | 卢迎伏 |
| 189 | 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城市书写 | 童 真 田翔尹 |
| 198 | 生育的规约：莫言小说《蛙》中的生命政治 | 都岚岚 |
| 206 | 论西方产业化视角关注下的中国电影研究 | 石 嵩 |

比较研究

- | | | |
|-----|--|---------|
| 216 | 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 李清良 戴诗成 |
| 229 | “宗教”的两种含义看儒学 | 成 璿 |
| 243 | 跨时空对话：德里达解构主义与僧肇中观思想
——以异质性为中心 | 庄佩娜 国 威 |
| 252 | 论中国诗学的文学地理学特征 | 钟仕伦 |
| 267 | 瑞恰兹在中国（1929—1949） | 宫小兵 |
| 286 | 领异标新 玉树中华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阶段成果
述论 | 董首一 张叹凤 |

专 论

当代中国文论的创新路径

曹顺庆 时 光

〔摘要〕 本文从审理古体诗词及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尴尬处境入手，深入追踪这一现象背后所潜设的思维缺陷。笔者认为，中国文论界整体思维中存在三个深层次的“死角”，正是这些“思维死角”让中国文论界选择了对现当代古体诗词价值的熟视无睹，同时也让中国文论自身陷入了言说困难、“失语”失声的吊诡处境。这三个“死角”是：学科划分和隔绝；“元语言”地位的失落；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主宰。文章最后，笔者初步提出了如何走出这些“死角”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 “失语症” 创新路径 学科划分 元语言 唯科学主义

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已多有方家论述，在此笔者不一一赘言。而它引起的负面影响也同样地在持续、发力，还在这个世纪之交（20 世纪至 21 世纪）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结合，呈现出更为令人担忧的态势。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高呼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希图“求新声于异邦”，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决绝的姿态完成了整个文论话语、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在这一进程中，白话文不但战胜了文言文，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言说方式压制、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言说方式，换言之，中国本有的话语权完全臣服于西方话语权之下。这一倾向在当下愈发明显。学界，尤其是文论界对于此现象的反思尤为深刻。孙津先生针对于此，不无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没有理论，这是我说的，至少现在是这样。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

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时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的)。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①

由此,我们引出“失语症”。

失语症(Aphasia)原本是医学术语,是指由于脑损害引起的语言能力受损或丧失,即因大脑局部病变导致的语言障碍。患者在无意识障碍情况下,对交流符号的运用和认识发生障碍。^②后来,这一术语被借用至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学界用以描述、反思本国文化体系在言说方式、概念范畴、话语规则等方面受到强势文化冲击现象的常用语汇。所谓“失语”,所失之“语”,正是上面分析的“话语”及相关的“话语权”。在明确这点以后,笔者拟简要概括“失语症”在中国所处的文化语境,并且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对近20年来笔者参与其中的、围绕“失语症”的提出所引发的学术讨论作一历史性的客观评价。

在中国,“失语症”一词在1990年率先被黄浩在《文学失语症》一文中运用,他用此词来指称中国新小说所面临的语言困境:“新小说所患的是运动失语症,即语言传达的功能性障碍疾病。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③黄浩以此术语来批判进而否定新小说一味模仿西方的语言实验。然而,“失语症”一词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还是在中国文论话语领域。笔者于1995年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首次指出了中国当下存在的“文论失语症”问题^④,紧接着笔者于1996年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继续深入探讨此话题,认为失语症是“属于隐而难见,并将遗患深远的严重文化病态”^⑤。作为“失语症”在文论界的“始作俑者”,笔者有必要指出“失语症”的提出是在世纪之交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文化事件,是基于对整个20世纪文化及文论发展脉络回顾、梳理基础之上的概括总结,是学界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所进行的必要准备。可以说,“失语症”的提出算得上是一种世纪末的“文化焦虑”吧。

此概念提出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对于“失语症”一词的误解远多于理解。借此机会,笔者将在下面作一扼要辨正。首先,

① 孙津:《世纪末的隆重话题》,《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② Paul Broca, “Perte de la parole, ramollissement chronique et destruction partielle du lobe antérieur gauche du cerveau”.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1861 (2): 235.

③ 黄浩:《文学失语症》,《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④ 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第十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⑤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失语”不是“失学”。正如上述对“话语”“话语权”的分析一样，笔者的着眼点在于生成言语表达背后的规则、系统，而不是只停留于在乎“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举世钦佩的学者”^①的数量上。其次，“失语症”的提出不是基于“文化原教旨主义”^②“文化复仇情绪”^③。在笔者的多篇文章中，“失语症”与“话语重建”是紧密相关的一组概念，笔者推重的“话语重建”是“杂语共生”“融汇中西”的，主张以包容的全球化视野而非排外、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平等对话、促进新质，“失语症”本身只是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并不带有倾向性，何况汲取本国传统文化精华是每个民族成长发展的题中之义，谈何“复仇”呢？最后，提出“失语症”更不是迎合时事的言说“策略”。笔者无意臆造“全盘西化的幻觉”，也并不认为这些实际问题是属于形而上的“理论错觉”，它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制造话题效应而提出的耸人听闻之言，它是对世纪之交文学理论界危机的客观描述，是以前存在当下仍然存在、需要学界通过漫长的艰苦努力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很欣慰的是，在“失语症”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④之后，学术界开始注意和正视中国传统文学及文化对于当下的重要意义，开始试图从微观层面解决这一症结，并取得了一系列相当可观的成绩。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失语症”的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最显豁的例子就是现当代文学史不收录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这部分古体诗词与中国文论一道在当下中国的教育体系及文化语境中所处地位仍然无比尴尬。

古体诗词及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尴尬处境

要想完整论述“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不被正统的现当代文学史收录”这一命题，泛泛而谈难免空洞无物。因此，笔者拟将此命题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从以下三方面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这三个次级命题分别是：一、现当代人古体诗词创作的实绩和影响究竟如何？二、现当代人的古体诗词是否应该被收录于现当代文学史？三、现当代人古体诗词入史对中国文论发展的意义何在？

古体诗词的地位和影响的衰落发轫于晚清民初夏曾佑、黄遵宪、梁启超

① 蒋寅：《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②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

③ 熊元良：《文论“失语症”：历史的错位和理论的迷误》，《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2期。

④ 程勇：《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江淮论坛》，2001年第3期。

等人共同推动的“诗界革命”。针对清代文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诗作大量泛滥的情况,这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试图以自身创作及理论提倡改良诗坛无病呻吟的状况。他们提倡言之有物,鼓励在诗中反映新事物、新时代、新气象,正如黄遵宪在《与朗山论诗书》中所言:“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①虽然“诗界革命”在后期提出了“旧风格含新意境”^②的口号,对于古体诗词的破坏力度极为有限,然而它毕竟在语言及内容层面从内部削弱、瓦解了古体诗词的地位与影响力。新文化运动所迈步伐则要更大更激进,对于古体诗词的地位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运动发起者认为“诗歌的声韵格调及其他种种形式上的束缚,我们要一概打破”(郑振铎语),准备“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③,并认为“此等没价值诗(指空洞无物之诗),尚无进古物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④。至此之后,正如黄修己先生所形容的那样,“旧诗词一直处在文学的边缘地位,没有发生过与白话新诗争当文坛盟主地位的争论,只是默默进行,不求闻达,不事声张,那态度似是超脱的、潇洒的”^⑤。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古体诗词的创作潮流是贯穿于20世纪始终的,其创作群体众多,创作数量庞大,对现实生活影响深远。即使是处于“不求闻达,不事声张”的状态下,古体诗词的身影一直未曾消失在20世纪的舞台上。从1909年成立的以“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⑥为宗旨的南社,到40年代延安时期的“怀安诗社”,再到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乃至当下“无不个性鲜明,自成一家”^⑦的网络诗词创作,一个世纪以来,古体诗词展现了自身绵长坚韧的生命力。古体诗词创作者众多,这里的“多”不仅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寡,更是指参与主体来源于广泛的社会阶层,这其中就有那些否定、批判古体诗词的新文学家,如开新诗一代诗风的郭沫若就创作有1400余首古体诗词;有戎马一生、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如孙中山、毛泽东、章太炎、于右任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阔达气象至今

① 黄遵宪:《与朗山论诗书》,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黄遵宪集》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2页。

②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

③ 胡适:《谈新诗》,吴奔星等选编:《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15页。

④ 刘半农:《是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转引自朱德发著:《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06页。

⑤ 黄修己:《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粤海风》,2001年第3期。

⑥ 高旭:《南社启》,《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

⑦ 刘梦芙:《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创作成就与存在问题》,“中华诗词六十年”高峰论坛暨创作研讨会论文,2009年。

仍熠熠生辉；有学者、画家，如程千帆、王季思、齐白石、黄宾虹……他们将古体诗词与自身所长结合起来，开拓了古体诗词的意境和表现领域。古体诗词发展到今日，其势愈炽，其影响力日益巨大，虽然不能像白话诗或者新诗那样成为诗坛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文学的一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卓著贡献。特别是在今日，古体诗词在民间发展迅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受众，联系到当下的国学热潮，我们学界不得不去重新审视古体诗词在当下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谨引用下面这段话作为笔者观点的补充，希望引起方家的重视和反思：

即便从中华诗词学会于1987年6月在北京成立20多年来说起，全国各地的诗词事业也是风起云涌，空前喜人，各种性质的诗词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八方开花、全面成长。据粗略估计，全国各地的诗词爱好者当有300万之众，中华诗词学会更是以将近10万会员的实力成为全国遥遥领先的民间社团之首。其中的年轻会员不在少数，各种形式的全国青年诗词研讨活动更是连续不断。^①

在对现当代人创作的古体诗词的实际成绩和影响有一初步认识后，第二个次级问题自然浮出：文学史是否应该收录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论者主张“重写文学史”，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意图将“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②。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怀着“开拓性的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③的初衷，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然而从近20年的理论建设以及“重写”工作情况来看，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其中仍存有的理论盲点：对于“重写”的思考主要是从政治历史和文学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而对于文言作品（包括古体诗词）这一维度有意或无意地选择性忽略。关于“文学史是否应该收录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这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笔者

① 王国钦：《试论“诗词入史”及新旧诗的和谐发展——兼与唐弢、钱理群、王富仁、王泽龙、陈国恩教授商榷》，《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3期。

② 黄子平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③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展望》，见陈思和：《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曾在《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①《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②等多篇文章中谈及此话题,并且不止一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文学史应该收录现当代人所创作的古体诗词。当然,反对此观点的人也有很多,针对这些论者所持的理由和论据,笔者也曾一一辨析、探讨,在这里不再赘述。

现在又有一些新的声音仍反对这一观点,笔者择取其中一二在此深入探讨。韩晗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上的《现当代文学史何必“无所不包”?——兼谈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体诗词的关系问题》^③一文思路清晰,论述谨严,就在这些声音中极具代表性。该文作者在梳理了“古体诗词”是如何被“新文学史”一步步逐出体系之外的历史后,提出了三个理由反对“古体诗词”入史:一、选择进入文学史教材的内容所遵循的是“无争议化”而非纯粹的“经典化”原则,文学史家是“总结者”而非“卓越的预言家”;二、作为一种语言,文言正在不断地退出历史舞台,古体诗词在当代不管是从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有逐步式微的征兆,另外其传播方式的小众化,注定其“沦落至现当代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三、对于现当代古体诗词史的研究应该以“专门史”而非“通史”的体例进行,对于古体诗词的传播应该化整为零予以“元素化”传播。对于第一点,笔者承认,“无争议化”固然是编写文学史教材的一大原则,文学史家的着眼点应在于“总结”而非“预言”。然而,笔者坚信文学史教材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我们不苛求文学史家预言未来的文学热点,但至少要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不断更新的背景下,最大程度上还原真正的文学史进程。在我们看到了现当代诗词在现当代的创作实绩之后,我们为何一再搪塞,而不是认真地梳理研究,做好一个“总结者”的角色呢?第二,在本文中,作者说“当下古体诗词的创作,其内涵基本上是‘现代性’的”,形式和内容的差异“为古体诗词退出历史舞台不自觉地提供了动力”。在笔者看来,这点恰恰证明了古体诗词生命力之所在,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古体诗词“形式稳定成熟,富于弹性和张力,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现当代古体诗词的创作是“一个从古典到现代的生动而且成功的文学演进过程”^④。而且,即使是看衰古体诗词的发展前景,这对于我们书写文学史的影响也很小,因为我们的文学史是总结相对固定的

① 曹顺庆、童真:《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

② 黄丹青、黄文虎、曹顺庆:《残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③ 韩晗:《现当代文学史何必“无所不包”?——兼谈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体诗词的关系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④ 张海鸥:《现代旧体诗词的相关探讨》,《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0日,第7版。

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并给出相应的评价，而不是对于一种文学现象的未来前景进行预判，拿着“前景”否定其历史存在的“合法性”的做法极值得怀疑、商榷。针对现当代诗词小众传播一项，笔者认为有欠客观。且不论现代时期知名诗词家的作品及其知名诗词集的广泛传播，即使是当下，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诗词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刘梦芙这样形容此巨变：“诗词借助于高科技手段，交流迅捷，无远弗届；作者多用化名，减少了在报刊发表的种种顾忌，更无编审程式，随作随发，故每能袒露真情，表现个性。伪劣之作一旦登出，会遭到尖锐的批评，众目睽睽之下，真假立辨。虽不免众声喧哗，鱼龙混杂，但毕竟能百花齐放，斗艳争妍。”^①这正是治文学史的学者所拥有的鲜活研究材料，怎么能够熟视无睹呢？第三，意识到关于现当代古体诗词的“专门史”写作的必要性相较于片面抹杀现当代古体诗词价值是一个不小的观念进步，然而“专门史”的写作并不能成为不完整书写“通史”的理由，相反“专门史”的写作正证明了“通史”将现当代古体诗词纳入写作范畴的必要性。举个例子，“新月派”或“新格律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闻一多晚期曾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题为《检讨》的七绝：“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鸩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写旧诗。”^②在诗中，他反思了白话诗运动的得与失，决心“勒马回缰写旧诗”。如果文学史家想把闻一多及其对“新月派”具有旗帜意义的“三美（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③理论讲清楚、说明白，就必须要结合新诗、旧诗两条发展脉络谈去，否则只能是自说自话，不符合当时文学实际。建议将古体诗词以“元素化”的传播方式接续生命力，这点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元素化”背后商品逻辑的存在。将“古体诗词”一股脑委任给商业化运作，希图让市场解决古体诗词所处的尴尬地位，这样的构想无疑将使“古体诗词”成为商品化、娱乐化的对象。倘若我们文学史家尚未能坦荡承认、公正书写“古体诗词”在历史上的地位，文学史教材不能充分发挥自身固有的导向作用，所谓的“创造符合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体’”这一设想就无从谈起。

呼吁“现当代古体诗词入史”的当然不止笔者一人，中山大学的黄修己教授也是此主张的积极倡导者。他在《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④《旧体

① 刘梦芙：《当代诗词的发展历程、创作成就与存在问题》，“中华诗词六十年”高峰论坛暨创作研讨会论文，2009年。

②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9页。

③ 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

④ 黄修己：《现代旧体诗词应入文学史说》，《粤海风》，2001年第3期。

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姻缘》^①等文章中，集中论述了现代旧体诗词入史对于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期待现代文学研究中“俗”（通俗小说研究）与“雅”（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的“比翼齐飞”。总而言之，他呼号奔走的落脚点在于完善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而笔者支持“现当代古体诗词入史”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出发的，这也是对于本节第三个次级问题的正面回应：现当代人古体诗词入史对中国文论发展建设的意义极为重大。笔者将现当代古体诗词入史的意义和价值概括为两点：以点带面；由表及里。首先，“以点带面”是指现当代古体诗词入史作为一个补足文学史缺陷的开端，必将带动学界对于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扩展学术视野，更新学术方法。例如，现当代古体诗词入史后，另外一个问题也自然浮出水面：现当代文言文创作的地位意义以及价值重估。倘若再向前推进，古代文论所涉及的押韵、对仗、炼字、用典、格律以及意境等诸多文学范畴如何与西方文学术语纠结、融合，如何生发出新的意义；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如何发声，又如何妥协、渐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被发掘出来，为我们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广阔且立体的研究领域。其次，“由表及里”。笔者认为现当代古体诗词入史只是争取“话语权”、让传统文化发声的初步阶段，它作为一个开始，必将迅速地与许多当下迫切问题相结合，成为学界深入思考的契机，例如古代文论当下有效性，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古代文论如何完成自身更新与进步、走向世界等问题，倘若这些问题能够被仔细回答、充分论证，那么这不仅能够带动对现当代古体诗词的认知与研究，更将促使学界在反思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基础上思考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说什么、应该怎么说。总之，恢复现当代古体诗词创作的应有地位，让古体诗词堂堂正正地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令其摆脱“无地彷徨”的尴尬处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倡导传承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传统，古代文论诸种理论就必然有用武之地，也只有这样，才真正谈得上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和话语重建。

中国文论“失语”之病因探究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当代古体诗词入史对中国文论发展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教育传承体制（包括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有助于使中国文论在当下体现出直接有效性，推动传统话语系统的直接流传。令人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稍加分析就能得出的显豁结论，时

^① 黄修己：《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姻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至今日,为何古代文论界对此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呢?笔者在经过深入思考之后,发现导致此状况的原因就在于文论界的整体思维中存在三个深层次的“死角”,正是这些“思维死角”让中国文论界选择了对现当代古体诗词价值的熟视无睹,同时也让中国文论自身陷入了言说困难、“失语”失声的吊诡处境。这三个“死角”是:学科划分和隔绝;“元语言”地位的失落;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主宰。下面分而述之。

(一) 学科划分和隔绝

黄修己教授对于现当代古体诗词处境的概况曾这样总结:“三不管”,即“研究古代的不管现代”“研究现当代的不管古体”“创作旧体的不管研究”^①。“三不管”一语极为凝练精准,又不无苦涩地指出了现当代古体诗词在当下语境中艰难的生存状态,同时也不动声色地批评了界限森严的学科划分背景下各个学科之间相互隔膜的奇怪现状。学科之间的严重隔膜状况在中国文论界同样存在,且问题严重、不容小觑。在《中国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延续》一文中,笔者曾这样写道:“在文学理论研究队伍中,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古代文学理论非常隔膜,彼此似乎有一条难以逾越的楚河汉界。某些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对当代文论的建设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似乎忘掉了研究古代文论的目的是什么。而一些搞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人几乎完全抛弃了中国古代文论,而一头扎进西方(包括俄苏)文学理论之中。在古代文论和现当代文论中间,极鲜明地呈现着一条巨大的断裂带。”^② 学科(discipline)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学科”是指一般而言的学术分支和学术组织机构,狭义的学科是指高等院校利用学问划分来组织高等院校教学、研究工作,以实现高校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之职能的单位^③。不同学科在高等院校的相继设立是在知识大爆炸、信息量呈几何级增长以及社会分工细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作为个体的学者在接受和学习海量知识的方式上只能从横向扩展转为纵向深掘,“专门化”人才取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全知全能型”人才成为智识阶层的主流,这样的时代趋势是客观而不容置疑的历史现实。然而,我们也要清楚看到这一趋势对于我们文学研究现实的“负能量”。学科划分固然有利于专业知识的传承和专门化人才的培养,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科划分的标准与方法应该是一个可调可变、允许模糊与交集的事物,它不应该成为各学科间交流对话的障碍。例如,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依据政治事件来划分文学

① 张海鸥:《现代旧体诗词的相关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0日,第7版。

② 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延续》,《当代文坛》,1988年第6期。

③ 鲍嵘:《学科制度的源起及走向初探》,《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

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文学在上个世纪发展、裂变的实情的,然而如果要对那些创作生命较长、横跨现当代的作家做出完整判断的话,现代、当代文学史家们必须要大胆跨过学科界限,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研究结论。再比如说,研究20世纪在西方影响极大的“意象派”诗歌,如果外国文学的学者不回到古代文论去对“意象”一语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把握的话,那么他对于“意象派”解读的学术价值就很值得怀疑。学科划分和专业细分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学科交叉和专业交流更是社会进步的迫切需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本身即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生发的有机整体,人为的切割、划分只能是策略性、暂时性的假设而已,而学术“杂交”的优势和自然界的杂交优势一样的道理早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了。我们将“学科的划分和隔绝”作为中国文论“失语”的“思维死角”之一,着眼点在于指出带有行政制度性的学科设置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限制了部分文论研究者的手脚与视野,使得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间出现了“井水不犯河水”的现象,乃至出现了“现当代古体诗词”这一“学术真空”。但是,仅止步于此,这样的回答只涉及到了问题的皮毛,对于正确认识现当代诗词乃至文言作品的价值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解读中国文论“失语”现象也是远远不够的。

从表面上来看,中国文论中“古代文论”和“现当代文论”的关系是各行其道、互不相干,中间隔着“楚河汉界”的。然而,如果我们从细部考察就会发现,事实上“现当代文论”和“古代文论”都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话语权”的支配,都面临着相同的尴尬处境,有着同样的困惑和迷思。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文论“失语”原因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于“古代文论”“现当代文论”的现状作一调查。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参与现当代文学大厦构建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笔者曾将现当代文学理论著作形容为“进口组装件”,有些是别人刚制造出来的,有的则是别人用旧了的,我们拿来刷刷漆,便犹如新产品一般闪闪生辉了^①。而我们研究者则像走进了超级市场的中世纪灰姑娘,在众多的选择面前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话虽然难听一些,却是当下理论界存在的苦涩事实:我们在理论确实极度贫乏,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如果说现当代文学批评是“舶来品”的话,那么古代文论或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在这一“舶来品”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产物。以古代文论界经常使用的浪漫主义这一概念为例,“浪漫主义”作

^① 孙津:《世纪末的隆重话题》,《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

为一个标签经常被文论界使用在李白身上,理由在于其诗文狂纵不羁的语言以及瑰丽神奇的想象力,这和实际上西方对于“浪漫主义”的理解大相径庭。对于“浪漫主义”内涵的阐发主要集中在华兹华斯撰写的《〈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一文中。华兹华斯在开篇即写道:“这些诗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①拿这个标准去检验的话,恐怕真正是浪漫主义的恰恰不是李白,而应该是诗歌语言通俗易懂、关注民生疾苦的白居易了。由此观之,古代文论界不但“失语”,而且还经常把外国“经书”念歪。构成中国文论主体的两大群体,一个“消化不良”,一个“经书念歪”,如此尴尬情况的产生并不是突发性事件,而是系统化、本质化、广泛化的进程。在此进程中,有两点本质性因素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失落以及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主宰。二者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当下中国文论“失语”“失声”的喉中之“鲠”。

(二)“元语言”地位的失落

“元语言”(metalanguage)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元语言的“元”(meta-)是来自希腊语的一个词素,表示“在……之后”(如 metaphysics, 玄学, 纯粹哲学)、“超越,处于更高发展状态的”(如 metapsychosis, 超精神)^②。因此将 metalanguage 一词理解为“超语言”或“语言之后的语言”似更为合理。《语言学百科词典》对于这一术语的定义如下:

元语言,又称“纯理语言”、“符号语言”,与“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相对。指描写和分析某种语言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或符号集合。^③

举些简单的例子辅助理解。比如我们用汉语来解释说明英语,汉语就是“元语言”,而英语就成了“对象语言”。同一语言中的情况也类似,英英词典中,对于某一条目的解释是“元语言”,而此条目本身则成了“对象语言”。“元语言”相较于“对象语言”而言有着抽象的、形式化的、超越客观所指对象的形式语言特点。本文中使用的“元语言”,其意义并不是从语言学出发的。“元语言”和“话语”一样,在当下的语境中正逐步走出哲学界、语言学

①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② 封宗信:《语言学的元语言及其研究现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

③ 语言学百科辞典编委会:《语言学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42页。

界,成为一个具有泛学科意义的普通术语,用以指称某事物在该领域具有的底层理论建构意义。从这点出发,我们可以讲文学理论就是文学的“元语言”,文学理论正是对于丰富庞大的具体文学内容的抽象书写,它超越于文学的同时又指导文学话语的生成与演变。正如语言学中与“元语言”相对的概念是“对象语言”,也即目标语言被“元语言”对象化、材料化了,我们将目光转至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道理是一样的,文学当然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唯一材料。对象化、材料化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在它们背后却暗含着“支配/服从”的权力规则。倘若文学理论“元语言”地位被剔除或是置换,不仅文学理论本身,就连全部文学都将发生难以估计的剧变。中国文论即处在“元语言”地位失落的境地。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失落原因,应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分析。从客观方面来看,政治历史因素对于促成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的失落具有直接、强烈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华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西方文化借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中华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动摇了。在民族危亡之际,救亡图存的意识,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求新声于异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文化……这种文化选择,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强迫下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非正常的发展。^①德里达说过:“问题永远在预期的原初复杂性和单纯开端的污染。”^②可以说,自20世纪一开始,西方文化即伴随着器物层面的船坚炮利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强力渗透,换言之,在中国文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在政治话语的优势下以长驱直入的形式进入了中国文化的肌体当中,并且在现实实践中不断证明着自身的即时有效性和可触可感的优越性。作为文学“元语言”的文论因为认识不充分、准备不充足,很快就在时髦多彩的西方理论面前败下阵来,成了古色斑斓的“秦砖汉瓦”,不再“发声”或者产生有效性。从主观方面来讲,民族心态的失衡也是导致中国文论“元语言”地位失落的重要原因。“天朝上国”的迷梦被“坚船利炮”惊醒,臆想中的优越感被现实击打得粉碎,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因此失衡,“最明显的状态是常常在自大与自卑两极上下滑动”^③。这种文化的失衡感具体体现在对于本有文化的强烈抨击以及对于外来文化毫不怀疑的崇拜。钱

①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② Jacques Derrida, *Le problème de genèse dans le philosophie de Hesse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90, pp. 6~7.

③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